

# 亚洲—香松本av—区V.9.0.3.5学术资源网

松本—香亚洲av—区 | 2026-04-11

松本—香亚洲av—区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将围绕松本—香亚洲av—区展开详细介绍，帮助读者全面了解相关内容。

## 松本—香亚洲av—区概述

考古天文学是天文学史领域中新兴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它使用考古学的手段和天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人类文明的各种遗址和遗物，从中探索有关古代天文学方面的内容及其发展状况。考古天文学使用各种方法来揭示过去实践的證據，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天文学、统计学、机率及历史学。由于这些方法多种多样，并且使用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如何整合成连贯的论点一直是考古天文学家面临的长期难题。考古天文学填补了景观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之间的互补空白。物质證據及其与天空的連結可以揭示更广阔的景观如何融入关于自然循环的信仰中，例如玛雅天文学及农业的关系。其他将认知和景观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例子包括定居点道路中嵌入的宇宙秩序的研究。考古天文学可以应用于所有文化和所有时期。天空的意义因文化而异；尽管如此，在考察古代信仰时，还是有一些科学方法可以跨文化应用。也许是因为需要在考古天文学的社会和科学层面之间取得平衡，克莱夫·拉格尔斯 (Clive Ruggles) 将考古天文学描述为「一个一方面是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是近乎疯狂、不受控制的猜测」。

尤安·麦基 (Euan MacKie) 支持汤姆的分析，他通过比较新石器时代的英国与玛雅文明，加上考古背景以论证这段时期存在著分層社會。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他在蘇格蘭擬建的史前天文台进行了几次挖掘。金特拉 (Kintraw) 因四米高的巨石而闻名，汤姆认为这是对侏罗山贝因·夏奈德 (Beinn Shianaidh) 和贝因·奥乔利亚斯 (Beinn o'Chaolias) 之间遥远地平线上某个点的预见。汤姆认为，这是地平线上的一个缺口，在隆冬时节，这里会出现双重日落。然而从地面上看来，日落会被山脊遮挡，观看者需要抬高两公尺：需要另一个观景台。科学家在峡谷对面发现一个由小石头形成的平台。文物的缺乏引起了一些考古学家的担忧，而且岩层分析也尚无定论，但在梅斯豪遗址和布什巴罗菱形遗址进一步研究使麦基得出结论，虽然“科学”一词可能不合时宜，但汤姆在高精度比对方面大体正确。相较之下，克莱夫·拉格斯 (Clive Ruggles) 认为汤姆的调查在数据选择上有问题。其他人则指出，地平线天文学的准确性受到地平线附近折射变化的限制。一些人更批评绿色考古天文学虽然可以回答过去人们是否可能对天文学感兴趣，但缺乏社会元素，这意味着绿色考古天文学很难回答人们为什么会感兴趣，使得绿色考古天文学对那些询问过去社会问题的人来说用处有限。凯瑟·金蒂 (Keith Kintigh) 写道：「坦白说，在许多情况下，某个特定的考古天文学主张是对是错，对人类学的进步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些资讯并不能为当前的解释问题提供参考。」尽管如此，研究星图排列仍然是考古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欧洲。

内布拉星象盘據稱是青銅時代描繪宇宙的文物的分析將類似於考古學其他子學科中使用的典型的發掘後分析。對一件文物進行檢查，並嘗試將其與民族歷史或人種學記錄進行類比。找到的相似之處越多，解釋就越有可能被考古學家接受。一個更平凡的例子是，羅馬帝國鞋子和涼鞋上發現了占星符號。鞋子和涼鞋的用途眾所周知，但卡羅爾·范德里爾·默里 (Carol van Driel-Murray) 提出，刻在涼鞋上的占星符號賦予了鞋子精神或醫療意義。透過引用其他已知的占星符號的用途及醫療實踐和當時的歷史記錄的聯繫，可以支持這一點。另一個具有天文用途的著名文物是安迪基西拉機械裝置。在這種情況下，對文物的分析以及西塞羅描述類似設備的參考將表明該設備的合理用途。光碟裝置上的符號使得光碟能夠被讀取，進一步支持了這個論點。

## 松本—香亚洲av—区的背景与发展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传说开端是四位萨哈巴（赛尔德·本·阿比·瓦卡斯、贾法尔·本·阿比利布、沃赫卜·阿布·卡布查（Wah(a)b Abu Kabcha)和贾赫须·伊本·瑞亚卜）在公元615至616年期间从阿比西尼亚出发，沿着吉大港-迦摩缕波-曼尼普尔的路线行进，最终于616至617年期间到达中国及开始传教。650至651年期间，在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的命令下，赛尔德·本·阿比·瓦卡斯又率领一支大使团第三次出使中国，并受到唐高宗的热情接待。

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唐朝的一些年代纪中最早被提到，中国人称他们为“大食”（大食这个名称是从波斯语的阿拉伯人“Tazi”依中文音译来的）。其记录可以追溯到713年大食大使到来。第一批定居中国的穆斯林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公元751年，唐朝和阿拔斯王朝在怛罗斯发生了冲突，但不久之后，两国就重归于好。公元756年，阿拔斯王朝有可能送了一批波斯人和伊拉克人到甘肃，帮助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大约五十年后，吐蕃帝国在中亚袭击了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为保证东部领土的安全，便与唐朝缔结了同盟。同盟书由时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下令送往长安。根据记载，公元758年有一大批穆斯林定居广州，导致广州爆发了动乱，原居民大批逃走。前者在广州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怀圣寺），1314年被大火焚毁，1349年-1351年期间又重建。现如今能见的最初建造的部分，就只有一座塔的遗迹了。唐朝时，有源源不断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或者走海上路线来到中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外界移民来的，还有很多皈依伊斯兰教的汉族人和回族民。波斯的移民将马球（Polo）、他们的民族菜肴、乐器和很多医学知识传入了中国。

大量穆斯林前往中国贸易，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宋朝时，中国的穆斯林主导着对外贸易——西部和南部产品的进口、出口。1070年，宋真宗邀请了5300名来自布哈拉的穆斯林来中国定居。宋真宗用这些人去抵抗辽国。这些人定居于燕京和开封府之间的一些地区，目的是创造宋朝与辽国之间的一片缓冲区。1080年，上万名阿拉伯人骑着马来到中国，定居于北部和东北部的一些省份。这些阿拉伯人由来自布哈拉的指挥官埃米尔萨义德王子“索菲尔”率领。这位王子后来被誉为中国穆斯林“教父”。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被中国人称为“大食法”（Dashifa）。而萨义德重新命名了伊斯兰教，称它为回回教，意为回人的宗教。

## 深入分析

中国在元朝统治时期，仍与蒙古其他游牧部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元朝的蒙古君主提升各宗教与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他外国人的地位，并迁入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信仰基督教的突厥人、犹太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和信仰疆传佛教的维吾尔人担任上级官位，而本地的儒家学者却都不被重用，所以当时中国朝廷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穆斯林。元朝被划分为12个行省，由省长和副省长管理。据伊朗历史学家拉什杜丁·法德鲁拉（Rashidu'd-Din Fadlu'llah）的叙述，这十二个省的省长，其中有8个是穆斯林；其他地区的副省长也都是穆斯林。与此同时，蒙古人引入中亚的穆斯林来中国担任行政官员，而蒙古人也向中亚地区送去汉人和契丹人，在布哈拉担任行政官员，这是在利用外国人来遏制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力量。在元朝时期，蒙古人使大量中亚穆斯林进入中国。到了14世纪，穆斯林的数量甚至已经达到了400万人。正在此时，一个波斯天文学家札马刺丁，向忽必烈介绍了波斯的七种天文仪器。同时，穆斯林建筑师亦黑迭儿丁学习汉代建筑形式，并设计、构建了元朝的首都——大都。14世纪时，一场在中国居住的色目人反对元朝统治的亦思巴奚兵乱在福建南部爆发。这场兵乱被镇压后，不仅使泉州、兴化一带的社会经济遭到了重创，也导致了当时世界最大港口泉州迅速衰落。成吉思汗和其后的元朝皇帝，一概禁止穆斯林的一些教条惯例，像禁止清真屠宰，让穆斯林使用蒙古人屠宰动物的方法，而且还对其他方面也有所限制。成吉思汗直接称呼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为“奴隶”，要求穆斯林遵循的蒙古的饮食方式而不是伊斯兰的。割礼也遭到禁止。犹太教徒同样受到影响——禁止吃洁食。在元朝要步入灭亡时，腐败和迫害活动变得极其严重，穆斯林将军和汉人一同反抗蒙古人。有些穆斯林团体的名字在中文中的意思是“兵营”（Barracks）亦或是“谢谢”（Thanks）。部分回族穆斯林声称这是因为他们在推翻蒙古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那些受到协助的汉族人起了这样的名字。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为实现他的野心，就派大将徐达带领军队向元大都进发。最后一位元朝皇帝逃到北方的上都。后来，元大都被改名为北平（即今天的北京）。

明朝时期，穆斯林仍然在中国活跃，其首都应天府是伊斯兰学术的中心地区。明朝经历了海港穆斯林人口迅速下降，这和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他最信任的指挥官都是穆斯林，包括胡大海、沐英、蓝玉和丁德兴。明朝时期也诞生了一位著名的穆斯林航海家郑和。明朝时期在北平居住的穆斯林相对比较自由，政府没有限制他们的

宗教信仰或信仰選擇，与普通臣民一样看待。朝廷虽然讓穆斯林保有信仰，但是藏传佛教和天主教教徒在北京却受到限制和压迫。

清朝统治期间，穆斯林在大城市建有许多清真寺，其中应天府、长安、杭州府、广州和其他一些地方（除了西部的穆斯林区）都是极其重要的。清真寺通常以传统的中国风格并带有阿拉伯语铭文作为主要特征。许多穆斯林担任政府职务，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位于重要的位置。因为旅行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也就逐渐变多，其中一些中国的穆斯林到达新西兰，并成为那里第一批穆斯林（参见新西兰伊斯兰教）。苏菲教派也在清代早期的几十年遍布中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苏菲门宦有：

## 相关内容介绍

卡迪林耶派：由中国人祁静一（教名为哈拉尔阿尔丁）建立，他是著名的和卓伊达雅图勒拉的学生，在回族苏菲派被称为“祁道祖”。在临夏市的拱北周围的神殿仍然是卡迪林耶派的中心地带。虎夫耶派：由一个纳克什班迪教团领导。哲赫林耶派：另一个纳克什班迪教团，由马明心建立。

这段时间里，穆斯林多次起事反抗清朝，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治陕甘回变、同治新疆回变和云南回变。清政府下令清剿叛军，云南回变中近百万人被杀，同治陕甘回变中上百万人被杀，另有人估计当时甘肃境内有九成汉民及三分二回民被屠戮。然而，在中国东部和南部各省的穆斯林并没有叛乱，也丝毫没有受到叛乱的影响。他们没有遭到过屠杀，也不想反抗。河南省的穆斯林村庄虽然很靠近陕西，但是那里完全不受影响，回汉关系仍然很融洽。北京的回族穆斯林在同治陕甘回变时期也未受影响。伊丽莎白·艾丽斯（Élisabeth Allès）曾写出，回族穆斯林和汉族的关系在河南地区很融洽，没有受到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叛乱的影响。原文这样写道：“十九世纪中期最主要的穆斯林叛乱，就数陕西、甘肃和云南一连串的事件了，和维吾尔人在新疆一样，似乎对中原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很多像马占鳌、马安良、马千龄、马如龙那样的穆斯林站到了清朝一边，并且帮助清朝将军左宗棠消灭穆斯林叛军。这些穆斯林将领都属于虎夫耶派，他们帮助清朝屠杀哲赫林耶派叛军。左将军将河州周围的汉人迁出去，把那作为帮助清朝清剿其他穆斯林叛军的穆斯林的报酬。1895年，东干起义爆发，被董福祥、马安良、马国良、马福禄、马福祥等忠诚的穆斯林所镇压，并且屠杀由马大汉、马永琳、马万福等领导的穆斯林叛军。一个由将军董福祥领导的效忠清朝的穆斯林军队“甘军”，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阻击外国军队。军中有像马安良、马福禄、马福祥等众所周知的将军。在云南，有记录写道，清朝军队仅仅屠杀叛乱的穆斯林，不伤害没有参加起义的穆斯林。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建立起中华民国，并执行了“五族共和”的政策。这使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极大改善。清王朝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外的交往会更加频繁。这使得中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接触机会增多。有一个叫克劳德·皮克斯的传教士，在1923至1934年间找到了834个去朝觐过的回族人。直至1939年，至少有33个回族穆斯林去过艾资哈尔大学学习。1912年，中国穆斯林联盟（Chinese Muslim Federation）在首都南京建立。与其类似的组织也在北京（1912）、上海（1925）、济南（1934）等地相继建立。各穆斯林团体的学术活动也蓬勃发展。在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前，已知的已经有上百种穆斯林刊物，其中有超过三十种是在1911到1937年间创立的。尽管临夏是当时中国穆斯林宗教活动的中心地区，但还是有很多宗教活动都转移到了北京。20世纪10年代时期，根据估计，中国本土有大约2000万的穆斯林。其中近半居住在甘肃，三分之一居住在陕西，其余的都住在云南。1911年时，青海、甘肃、宁夏各省落入了以马步芳和马仲英等人为首的马家军的手中。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施行“三光政策”，并破坏了许多清真寺。据 Wan Lei 所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941年4月，日本摧毁了220座清真寺，并屠杀了无数的回族人。”在南京大屠杀后，南京的清真寺中堆满了尸体。同时他们也施行经济压迫政策，其中涉及到对清真寺的破坏，并导致许多回民失业、无家可归。再者就是一些故意的侮辱性的政策，例如将肥猪肉涂在清真寺上、强迫回民给士兵们杀猪、表面上是在强迫女孩做艺妓和歌手的训练，但事实上却将她们充当性隶。连回族的公墓也因军事原因被毁坏。因此许多回族人都加入了抗日战争。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后，属于中国国民党党员的那些穆斯林移居台湾。

以上就是关于松本一香亚洲av一区的详细介绍。松本一香亚洲av一区等相关话题也值得进一步了解。

